

翻译与汉学史的互动

——兼论编译与改译

黄卓越

摘要：本文原为作者2016年4月应邀出席白俄罗斯国立大学语文系举办的“中白文化与教育对话：历史、现状、未来”年度研讨会时所做的演讲，经整理、补充而成文。文稿主要讨论了早期汉学发生之初，翻译在汉学史中的地位，以及后来展开的两者间的互动。其中也涉及对翻译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编译、改译等的描绘与分析，试图借助这些线索而对翻译史的研究而有更深入的思考。

一 简短的引语：翻译的分类

在当今的学术界，当我们提到“汉学”这一概念的时候，一般都会偏向于指一种研究性的活动及其成果。但是早期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在20世纪40年代，曾在中国与美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方志彤，即在其文章中径将汉学划分为两大种类：考证派与翻译派。^[1]方志彤所谓的考证派，在用语上还不是很准确，应当指的是以各种论文或专著形式撰写的学术成果。然而，他所谓的翻译派，既然能够独成一脉，也是因为在当时或之前都普遍存在，且非常引人瞩目的一种现象，因此可以与研究派（“考证派”）相提并论。

当然，即便是从汉学史上来看，由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面相当之广，因此还是可以再细分的，大致可以分为实用性的翻译与学术性的翻译两个大项，又粗略可对应于学界所说的实用汉学与学术汉学。^[2]如果要做一个较为清楚的界说的话，实用性翻译一般可包括诸如语言教学中的翻译、商务性翻译、外交语言的翻译等，虽然此类翻译在早期也会不同程度地介入到汉学的组成机制中，因而有时也会被汉学史作为背景或铺垫提及，但不会成为汉学史叙述的主要对象。学术性翻译主要是指各种哲学、史学、宗教、文学等书籍或著述的翻译，其中，文学书籍，尤其那些文学作品，尽管对其翻译比较特殊，但是一般还是会将其纳入汉学史中予以认定与考察，这也已成为汉学史研究与书写中的一个惯例。

当然所谓的学术翻译，也因其目的、形态等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汉学史的研

究中是需要对其有所分辨的，不能完全以当代的“学术”概念去笼罩。就目的而言，比如有的翻译其实也是译者为更好地学习汉语，而作为一种练习之用；有的翻译是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或向本国介绍与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当然在殖民竞争时期，这一类的翻译也常会带有一些政治上的意图，比如为了搜集情报等；有的翻译，则是为了通过借用异国的表述而改造本国的文化与思想，这点最为鲜明地体现在18世纪法国对中国思想的引进中；还有的翻译主要是为了向本国的读者提供一种异国情调，为本国人增添阅读的兴趣及对异域浪漫想象等，这类译本也因此会获取比较大的市场效益；再有一些翻译则主要是为研究之用，将翻译文本视为一种研究的原材料，等等，不一而足，关于这些，我们都是能够在翻译史中找到大量例证的。当然，时至今日，我们基本上已经能够更为平和地看待翻译的问题，并将之视为一种多元文化交流及不同文化互享的重要通道，由此也体现出了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与发展。

翻译的形态，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在此也需要一提。根据学者的各种论述，可以笼统地将之概括与划分为直译、意译、改译、编译等数种。关于直译与意译，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多，在此就不多赘述了。关于改译，甚至也包括编译等，其实也是汉学史上普遍可见的一种现象，尤其在早期，在还没有什么版本意识、学科意识，甚至在译者对第二语言还不是掌握得很熟练的情况下，改译与编译便会在翻译活动中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即便是在当代，这种现象也并没有完全消失，有鉴于此，我们下面还会述及。

二 翻译进入汉学史

现在让我们回到汉学史之中。仅以西方或欧洲的汉学史为坐标，我们目前一般会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一是从16世纪末利玛窦等进入中国至18世纪末，学者称之为“前汉学时期”，因为又是以传教士的研究为主，有时也称为是传教士汉学时期。第二个大的时期是从19世纪初开始，以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汉语与满语、鞑靼语”教授席位为标志，而创建的学院派汉学，学界一般将这一节点视为是汉学的正式诞生期。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传教士汉学在此后就消遁不见了，而是依然与学院派汉学并行延伸了很长一个阶段，大约要至20世纪30~40年代才基本退出历史的前台。

在前一个大的时期，我们知道，翻译也是西方传教士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最初进入中国的罗明坚、利玛窦都曾将中国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既作为进一步研究之用，也在其中灌注了研究的心智。关于前一大时期中的翻译与出版情况，我们可借助费赖之（Aloys Pfister）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1552~1773》，以

及荣振华(Joseph Dehergne)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1552~1800》得以全窥。^[3]此外,也可以参见法国人高迪(Henri Cordier)撰写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等。尽管翻译在前汉学时期的书写活动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特别大,但也已成相当的规模。当时传教士们大部分关于中国思想的论述主要就是依据这些译本进行的,如最负盛名者有耶稣会士合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柏应理等编译)、“索引派”的《易经》译释等,^[4]由此而自然会被各种汉学史作为重要的内容追述之。

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俄国汉学的例证,这当然也是一最为显明的特例。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俄罗斯汉学是以1741年罗索欣(И.К.Россохин)担任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满汉语翻译为正式开端的。然而我们却惊奇地发现,在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中,俄国的汉学研究成就几乎主要是由翻译构成的,直到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才稍有所改变,大约要到19世纪后期的瓦西里耶夫(В. П. Васильев)才形成翻译与研究并重的格局(也有学者认为这个转变应当以阿里克谢耶夫为标志^[5]),关于从罗索欣到瓦西里耶夫的汉学史,可根据中国学者阎国栋在《俄罗斯汉学三百年》一书中提供的材料,^[6]将他们的成就——当然主要是翻译上的成果,以表格形式罗举如下(见表1):

表1 俄罗斯汉学三百年翻译成果举

汉学家	翻译目录举要	说明
罗索欣 (1717~1761)	1.《满语和汉语学习簿》(译自《满汉字清文启蒙》); 2.译作《1730年京报摘抄》;3.译作《1735年中国钱粮交纳情况》;4.《皇舆图》;5.编译《中国历史》; 6.编译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8.《资治通鉴纲目》;9.《八旗通志》中的5卷;10.《名贤集》《三字经》等;11.《简明赋役全书》	共翻译满语与汉语著作30多种,出版的有5种
列昂季耶夫 (1716~1786)	1.摘译《易经》;2.译释《大学》《中庸》;3.《德沛是汉人》(译自《实践录》);4.编译《中国思想》(收译文28篇);5.《圣谕广训》;6.《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7.《大清律》;8.《大清会典》; 9.《八旗通志》;1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曾参考罗索欣本);11.《异域录》	翻译有20多种著作,多从满语译出

汉学家	翻译目录举要	说明
比丘林 (1777~1853)	1. 翻译《四书》(未刊); 2. 译释《三字经》; 3.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 4. 《大清一统志》; 5. 《大清会典》; 6. 《北京志》(译自《宸垣识略》); 7. 编译《中华帝国详志》(素材译自《大清会典》《大 清一统志》); 8. 编译《中国农业》(依据《授时通考》); 9. 《中国钱币描述》(从日语译出); 10. 编译《西 藏志》; 11. 编译《西藏青海史》; 12. 编译《蒙古纪事》 (后又译成法文、德文); 13. 编译《成吉思汗家 系前四汗史》; 14. 编译《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志》	大部分著作由汉语典籍编译而成, 此外就很少有其他著作了
卡缅斯基 (1765~1845)	1. 《通鉴纲目》(止于明代); 2. 《元史》(本纪部分); 3. 翻译利玛窦《天主实义》; 4. 《太上感应篇》; 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译作多自满语
列昂季耶 夫斯基 (1799~1874)	1. 《满文诗歌散文体译文》; 2. 《旅行者》(小说); 3. 《示我周行》; 4.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另有“俄书汉译”, 即将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译成中文
瓦西里耶 夫(又译 王西里) (1818~1900)	1. 《满洲志》(译自《盛京通志》); 2. 《宁古塔纪略》; 3. 《大清初期对蒙古人的安抚》(译自魏源《圣武记》); 4. 《魏书》; 5. 《辽史》; 6. 《金史》; 7. 《元史》; 8. 《辽 志》; 9. 《金志》; 10. 《蒙鞑备录》; 11. 《读史论略》; 12. 《军机大臣马思哈出巡边疆日记》(译自马思哈 《塞北纪程》); 13. 《西藏地理》(为敏珠尔活佛 《世界广论》的部分翻译); 14. 《印度佛教史》(译 自藏文); 15. 《翻译名义大集》(原文为梵藏合文); 16. 《西藏佛教史》(原作者为松巴堪布); 17. 《玄 奘印度游记》(编译自《大唐西域记》)	已始进入独立研究与翻译并重, 而其独立研究的水平也已很高

虽然表 1 只是列举了一些最为重要的汉学家, 但从中已可窥知, 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末, 俄罗斯汉学的成就便主要是由翻译构成的。与此同时, 我们也至少能够发现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两个变化的趋势, 一是由几乎完全是翻译逐渐走向翻译与研究并重, 但即便是到了 20 世纪初的阿里克谢耶夫, 也还是非常重视翻译, 这已经成为俄罗斯汉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二是由一开始多从其他文字转译(这些文字有法语、英语, 尤其是满语等), 到后来逐渐转向直接译自汉文, 从而也从一个方面说明, 俄国汉学界的汉语水准是在不断提高的。当然, 转译的事例, 绝不仅仅局限于俄国, 在早期欧

洲也是相当普遍与盛行的。此外，俄罗斯汉译还有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作家也参与到翻译中来，比如阿赫马托娃、吉托维奇、阿达里斯、斯腾堡等，都曾经承担过为汉文润色与加工的工作，这些不懂汉语的学者在介入翻译的时候，必然也会对原文做较大的改动。

俄罗斯汉学中呈现出的这一现象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专业汉学的发生地——法国，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仅以 19 世纪最为著名的几位法国学者如雷慕沙、儒莲、德里文、巴赞等为例，他们的主要汉学成就也同样集中在翻译上。请见下文：

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第一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有《法显传·佛国记》的翻译与注释，戴密微以为这是其“最重要的和不算最陈旧的著作”。另翻译《中庸》、《玉娇梨》、《太上感应篇》、《真腊风土记》、《和阗史，古玉研究系列》等。雷慕沙采用的基本上是意译法。其他还有不少论文。

儒莲(Stanislas Julien)——师承雷慕沙，第二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当代最重要的汉学奖“儒莲奖”的设立者。翻译的作品有《孟子》(从满文译出)、《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亚洲地理和中印文献学论集》(译自汉文《突厥历史资料》)、《太上感应篇》、《天工开物》、《道德经》、《复仇豹》(小说)、《赵氏孤儿》、《西厢记》、《平山冷燕》、《玉娇梨》等，编译了《中国小说选》等，儒莲的汉学书目很长，但主要为其翻译的作品所占据。

德里文(Hervey de Saint Denis)——师承儒莲，第三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翻译有《离骚》、《三种中国小说》、《六种中国小说》、《中国藩部民族志》(编译自《文献通考》)、《唐诗选译》等。

巴赞(Antoine Bazin)——师承儒莲，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首任汉学讲席教授。翻译《中国戏剧》(含《熬梅香》、《合汗衫》、《货郎旦》、《窦娥冤》)、《琵琶记》，以及《金瓶梅》、《水浒传》的若干章节等。

虽然在以上的例举中，我们会有意地突出他们在翻译上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抹杀了这些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但是，事实也证明了早期法国学院派汉学家们在翻译上的成就是要超过其学术研究的。正如佛莱什(José Frèches)所总结的：“(在雷慕沙之后)，法国汉学家们的全部著作都是有关 19 世纪汉学的两大典型内容的：语言学和翻译。”^[7]至少从俄国与法国的事例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 20 世纪之前，翻译占据了汉学史最为重要的篇章，法国的情况大致要以第四任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

沙畹 (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 为界才有所改变, 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自 19 世纪才正式启动的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 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但不少著名的汉学家如理雅各 (James Legge)、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 等也均主要是以翻译而不是学术论著建立起自己辉煌的坐标的, 此似无须再一一举例。这些情况在过去或许也已为学者们所意识到, 但仍需要通过一番梳理才能勾勒出来, 并将之突显于能够见到的前景之上。翻译当然无论在形态与功用等方面都与研究不同, 但其也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的文字转化活动, 而往往会贯穿着与研究同样的心智。鉴于中文原著通常具有的文字与语境上的晦涩, 以及典故运用的频繁、意义上的承袭等, 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或译者来说, 在没有进行大量研究的前提下, 是很难想象能够将之顺利地翻译出来的。仅从这一点来看, 翻译也已有理由堂而皇之地进入汉学史的载录谱系中。

三 编译与改译

上文已经述及, 翻译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除了我们今天最为常见、已成惯例的照本依句式的直译之外, 在汉学史发生的早期也存在着数量上相当可观的编译与改译的现象, 这可能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因一直为研究者所忽视, 有必要在此专门提出来一述。

编译, 指不是完整、确切地译出原本, 而是选择性地翻译原著中的一部分, 其中也常会渗入编辑或加工的成分, 其程度则大小不一。有关于此, 从前举的罗索欣、比丘林等早期俄国汉学家的例子中已可看出, 编译其实在他们翻译中占据一个相当大的比重, 其他欧洲国家早期汉学的翻译状况也多未例外。在英语世界, 比较典型的一则例证便是由英国 19 世纪汉学家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撰写的《中国文学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 一书, 经过对所有章节的对比, 我们发现这本曾为撰者获得巨大声誉的目录学著作其实便是一本按照中国的《四库提要》编译而成的英文文本。^[8] 全书分为四章, 分别为经书、史籍、哲学著述与“纯文学” (Belles letters), 恰好对应于原来的经、史、子、集四部。^[9] 而以其中的“诗文评” (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 一节为例, 撰者主要就是摘译 (编译) 四库提要而来, 而且其摘译的方式也明显地表现出其对该领域是相当陌生的。但是因为当时英国汉学尚处于草创阶段, 因此英语读者无法判断其著作的实际来历, 而是仍为其知识的渊博而表现出高度的赞叹, 误以为是伟烈亚力的一个独构之作。^[10]

编译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将不同原本中一些篇章与段落摘译出来, 并按照预设的主题编辑在一个本子中。如果暂时不考虑译文的情况, 也可称这种方式为“编纂”。编纂的一个重要目的, 也许是为了拢聚知识, 从而为后人能够从中汲取资料提供来源。

这其实在中国古代与西方的亚历山大时期都是很发达的，^[11]从背景上看，与知识流通的困难以及刻写技术的落后等均有一定的关系。在早期的汉学史中，小到一些文学作品的合集，大到一些辞典、类书等的统编，都不一定是原作的照章翻译，而属于编译的范畴（比如大量辞典、字典的释义都会参照汉文的原本，然后又有所改写）。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会以为这种方式是不够科学的，但如果我们明了早期的汉学一般会更多含有实用性的意图，或许也就不会因此而感到奇怪。许多如此编译而成的著作，因为标题的改变，在未做翔实考订的情况下，也是很难发现其所对应的来源的。

改译，有时与编译的定义边界并不是很容易区分开来，而且其情形也多不一样。但为了对之有一个大致明晰的概念，也需要与编译加以界分。在这里，可以用以专指那些出于主观意图，或为创造特殊的文本效果，对原文中的一些字句、字义等所做的改造性翻译。此种现象有时是比较微妙的，有时则是显明的。比如在早期对孔子《论语》的翻译中，各种不同的版本都会根据译者自身的理解，而使原文的一些句子向自己所意愿的方向靠拢。目前我们的翻译理论很多谈论的便是这种翻译方式，并试图透过译本的表象去发现其内含的一些观念性的机制。从归化式翻译的效果看，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有多少民族，就有多少个孔子。改译也会最多地出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这与文学本身就被视为虚构性作品是有密切关系的，从而也成为早期中文西译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12]当然，“改译”与另一邻近的概念“改写”也许还是有所差别的，大致可以认为，当改译的幅度在主体创制的延长线上逐渐加大，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或改变了原作的面貌时，就进入了改写的领域。有的改写会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相对仍比较靠近于改译，有些则未必有一直接翻译的过程在内，自主性的成分更大。后者最为显著的便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法国作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一剧的创作以及德国作家歌德的《埃尔泊若》一剧的创作，此二者均是根据元代中国戏剧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刀阔斧地改写以成的，这两位欧洲作家都不懂中文，因此都是借助于他人译本，再做自主性的创造。

从文学想象力的角度来看，改译尽管不合标准的规矩，但我们依然能够将之视为在翻译史与汉学史上相当有趣的一种现象，尤其是当其出现在诗歌翻译的领域中时。最具代表性的例证恐怕要算 20 世纪初的美国意象派 (imagism) 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了，这一运动始于大约 20 世纪 10 年代，经过两次高峰式的运动，直到现在仍有余绪蔓延。意象派形成初期即受到一本汉诗译本即柔迪特·戈蒂叶 (Judith Gautier) 所改译的《玉书》 (*Le Livre de Jade*) 的影响，^[13]庞德 (Ezra Pound) 等人的新诗实践中也含有大量改译或改写的事例。早期意象派的批评理论主要建立在费诺罗萨 (E. F. Fenollosa) 对于汉字的理解之上，如费氏以为每一个汉字都包含有一个意象，是“记

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图画”。^[14]比如“伙”的字形是一个人加上一堆火，表示“集体用餐伙伴”；“春”的字形显示太阳底下万物萌发；“男”的字形是稻田加上“力”；“束”的字形表示太阳的符号绞缠在树枝上，等等。这种解释也使得一个阶段的意象派诗人往往会按照这些字形表示的意义来翻译汉诗，比如像鲍瑟尔（V. W. W. S. Purcell）、艾斯珂（Florence Ayscough）、洛威尔（Amy Lowell）等的汉诗翻译都曾有大量这方面的实践，当然，后来的翻译已比较多地集中在对汉诗意象、意味等的酝酿与制作上，不再坚持生硬的“拆字法”。但不管怎么说，意象派诗人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会从我自己特殊的美学原则出发，来理解与翻译他们喜欢的中国诗歌，从而使改译或改写成为这一同盟所默认的规则。^[15]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与之相应，美国汉学界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汉诗研究，也颇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如鲍瑟尔于20世纪20年代所著的《中国诗歌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即贯穿了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诗学主张。在学院派的研究者当中，麦克雷什（Archibald Macleish）于1960年撰写《诗与经验》（*Poetry and Experience*）、麦克诺顿（William McNaughton）于1963年发表《混合意象：〈诗经〉诗学》（*The Composite Images: Shy Jing Poetics*）一文、华兹生（Burton Watson）于1971年出版《中国抒情诗：2世纪至12世纪的诗歌》（*Chinese Lyricism: Shih Poetry from the Second Century to the Twelfth Century*）一书，都可看作是在意象派诗学理论的启迪下完成的。著名的陶诗与文论研究者海陶纬（James Robert Hightower）也是因年轻时受庞德英译汉诗的影响才决定选习汉学的，后来名扬美国汉学界的学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庞德，叶维廉（Yip Wai-Lim）不仅是第二波意象派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专门撰写了《艾兹拉·庞德的〈神州集〉》（*Ezra Pound's Cathay*）一书。^[16]为此，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20世纪初的意象派及其译诗活动，就不可能有后来相当长一个时段的美国汉诗研究，由此，也证实了翻译对汉学史所可能提供的巨大驱动，及两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互系性关联。

为对意象派汉诗改译与改写的形式有更清晰的理解，文末，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一便是意象派之祖的庞德，他有一首题为《刘彻》的诗歌，改译或改写于汉武帝的《落叶哀蝉曲》（托名）。中文原诗为“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庞德据此而写的诗作是：

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

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 still,
 And she the rejoi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

这是改译与改写同时并存于一首诗中的例子，中国国内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曾将之选入其中，并有学者对之有过精彩的分析，以为庞德的诗作对原作至少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更变，一是削减了原诗中的抒情句式，突出了意象的叠加，使意味更加含蓄、凝练，这与意象主义的创作理念有密切关系；二是也改造了一些句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写了尾句，“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old”。原诗中有“落叶”一词，但没有赋予其形态，而庞德则在此前缀以“潮湿”一词，大大加重了树叶的可触摸感与感受性分量。“粘”字的用法，同样也促进了意象的并置，使人能够看到“它孤零零的形象，感受到它在门槛上弯曲的痛苦”。^[17]

其二就是最近发生在中国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诗歌翻译与传播高层国际论坛”的“国际诗歌之夜”上的一件事，两位来自美国的诗人、汉诗翻译家朗诵了他们的诗篇，竟然都带有非常突显的意象派诗学的风格。丹尼斯·马洛尼（Dennis Maloney），据说曾师从意象派大师施耐德（Cary Snyder），朗诵了一首《如果陶渊明到访》（*If Tao Yuan Ming Came to Visit*）的自撰诗作。另一位叫徐贞敏（Jami Proctor-Xu）的女诗人朗诵的自撰诗是《柳》（willow），她的全诗是这样的：

Willow 柳 liǔ

two orioles call from the green willow
 two boys cross a river returning home
 a boy slips yellow feather waves beat against weeping branches
 beneath a flurry of orioles
 one boy reaches the other shore
 柳 liǔ willow 柳 liǔ
 one boy reaches the other shore

两个黄鹂鸣翠柳

liǔngge huángrlí míng cuìliǔ

流 *liú*

a line of egrets ascends the blue sky
 a line of words enters the river's flow
 in green waters, a friend searches for a friend
 from his mother's window, the snow of a thousand autumns
 accumulates on the west peak
 why this need for a body to burn, to bury, to burn

流 *liú* flow 流 *liú*

两个黄鹂鸣翠柳

liǔngge huánghlí míng cuìliǔ

a line splits in seven directions
 a letter, a character collide against the stone's gray surface
 all he finds is his friend's face
 he carries it in his hands all he has
 to hand to a mother
 the snow of a thousand autumns on the west peak
 anchored in the doorway, a boat from three thousand miles east
 留 *liú* to remain, to retain, to stay
 留 *liú* to keep
 two orioles call from the green willow

从上可以看到，这首诗歌的排列方式是比较特殊的，有点像“阶梯诗”，也有点像中国古代的“游戏诗”，但作者在处理它们的时候显然是非常精心的，试图借之制造出一种视觉上的特殊效果，从而也告诉我们，诗歌不仅是可听的，也是可看的，这无疑源于意象派的重要诗学主张。在另一方面，熟悉中国古诗的读者，立刻就会看出，徐贞敏的诗歌借用了中国诗人杜甫的《绝句四首》之三，其中起到引领与构造作用的便是杜甫的原诗，这也是徐贞敏根据杜诗翻译出来的，而同时她又补充了自己所臆想的许多细节，大大充实了整幅画面的质感，也改变了原诗的抽象性，并使之朝新的理解方向移动。这种模式当然不是徐贞敏所独创的，而是可以在过往的意象派诗歌史上找到相似的前例的。以此为例，我只是想借之说明这样一种传统的绵延流长。对于这样一类诗作，我们可能不是很容易将之做严格的分类式的判断，它似乎已更多

地超出了改写的范畴，并非常奇妙地栖身于改译、改写与创写之间的模糊地带。

那么，我们能够允许这种情况的存在吗？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因为涉及作者的基本动机，如果你的愿望是在创作，或部分的创作，那么恐怕没有人能够阻止你的行为方式，但是你的愿望是在复原，是在从事一项严肃的译介工作，那么“忠信”应当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遵循原则，哪怕是一个词语在翻译中稍微扭曲了，也会受到学术机制的监视与科学之眼的毫不容情的挑剔。此外，这也要看你所面对的文类是什么。最后，我想说明，在这里讨论编译与改译，绝不是想要提供任何一种新的翻译原则，而只是想说明，在汉学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许多各种各样的翻译例证，尽管有时有些译文会不按规则出牌，脱缰而去，但也已深刻地烙在了汉学史的年轮中。因此，我们似乎也几乎无法抗拒它们迈入汉学史的凌乱与跳荡的步伐。

注释：

- [1] 方志彤：《卫礼贤教授及其著作》，《研究与进步》第1卷，4期，1940年1月。
- [2] 参耿昇《法国的学术汉学与实用汉学》，《法国汉学史论》上，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页161-198。当然实用汉学也指“研究”的指向，比如国际政治等，但在实用的意义上，仍可与实用翻译对应。
- [3] Aloy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1934. 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en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Letouzey & Ané, 1973.
- [4] 对于这二种著述的详细分析也可参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中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页267-362。
- [5] 李明滨：《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页2。
- [6] 参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 [7] 若瑟·佛莱什：《从法国汉学到国际汉学》，载耿昇《法国汉学史论》上，页22。
- [8]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edited in 1867; Reprinted in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2.
- [9] 关于伟烈亚力该书出自《四库提要》一事，瓦西里耶夫早在其《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也曾语及，参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史纲要》，莫斯科：东方出版社，1980，C pp.24-25。
- [10] 黄卓越：《从文学史到文论史——英美国中国文论研究形成路径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4期，页204。
- [11] 关于亚历山大时期的编纂学，可参雷诺兹、威尔逊合著的《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苏杰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页17。
- [12] 具体的例证也可参见宋丽娟、孙逊《“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1735-1911）——以英语世界为中心》中提到的若干事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6期。
- [13] 该书的译者柔迪特·戈蒂叶为法国唯美主义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叶的女儿，自己不懂中文，因此是在他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并多加入自我想象的成分，后又转译为包括英语在内的其他多种文字。事见于钱钟书《谈艺录》（九）“长吉字法”，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出版集团2013年重订本，页139-141。

- [14] Ezra Pound, *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 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est Fenollosa*,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0, p.363.
- [15] 钟玲曾将意象派诗人与学人的这种做法称之为“创意英译”，参其《美国诗与中国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页 33-55。但就其所举的例证看，有些还不算改译。
- [16] Yip Wai-Lim, *Ezra Pound's Catha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17] 参 <http://baike.baidu.com/view/1549617.htm>。另裘小龙所译彼德·琼斯的《意象派诗选》中也收入了此诗，并对之改译法有释。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页 207。